

殷周金文集成

修訂增補本

第一冊

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

修訂增補本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7

ISBN 978 - 7 - 101 - 05034 - 9

I . 殷… II . 中… III . 金文 - 匯編 - 中國 - 商周時代 IV . K877.3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09284 號

責任編輯:趙 伏 鄭仁甲

殷 周 金 文 集 成

(修訂增補本)

(全八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科地亞盛圖文設計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80 × 1230 毫米 1/16 · 460% 印張 · 1810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2000 冊 定價:240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5034 - 9/H · 269

編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王世民（項目負責人）

陳公柔（承擔全書內容的核校，部分酒器及水器、雜器(09106～10583)的分編)

劉雨（承擔多數鐘罍(00001～00285)、簋、盨、簠、敦、豆(02911～04695)、爵、角(07313～09105)等類的分編)

張亞初（承擔匕、鼎(00966～02841)、尊、解、觚(05441～07312)、矛、劍、雜兵(11411～12113)等類的分編)

曹淑琴（承擔鬲、甗(00441～00755)、卣(04701～05433)、戈、戟(10591～11407)等類的分編)

王兆瑩（承擔全書新收器銘的墨拓，部分器類的版面排定，及個別器類(00286～00429)的分編)

劉新光（承擔全書新收器銘的墨拓，部分器類的版面排定）

修訂增補說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一書，作為國家「六五」「七五」期間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於一九八四—一九九四年由我局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曾先後榮獲多種獎項，其中有：首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一九九二）、第二屆全國優秀圖書獎榮譽獎（一九九五）、首屆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一九九三）、第二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一等獎（一九九五）、首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研究成果獎榮譽獎（一九九九）。

為進一步滿足讀者的需要，本局徵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同意，現將該書重新出版。我們在劉慶柱所長、王巍副所長的大力支持下，特由考古所提取全書拓片原底重新電子分色製版，並約請原編輯組負責人王世民先生對本書進行修訂增補。所作修訂增補有四：

（一）對說明中的著錄項，增補原未及收錄，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內外出版的五十六種相關圖籍（包括金文彙編、博物館藏品圖錄、考古發掘報告和有關論著），訂正個別器物的斷代和現藏地。其間，曾參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本書為基礎製作的「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並且得到該所金文工作室的諸多幫助，承提供二十種圖籍的著錄資料備用。又曾得到上海博物館青銅部的幫助。增補的圖籍，多有前未著錄的銅器圖像，這在短時間內難以出版本書圖像編的情況下，可為讀者提供一定的方便。需要聲明的是，國內外某些收藏單位之間的藏品流動，以及單位名稱的改變，大多一仍其舊，未及全部訂正。

（二）對戰國時期的刻銘兵器及其他字迹不清的器物，增加了摹本。其中除轉錄各書已有摹本及另行注明者外，均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董珊先生應邀特地製作。又對個別原拓不全的器銘，更換了拓片。

(三) 統編全書的器物出土地索引、器物現藏地索引、器物著錄書刊索引，此工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獻資料中心辛愛罡女士承擔。另外還新編了《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錄遺》《金文總集》等五十多種書刊與本書的器號對照表，此表由中華書局編輯部製作。有此對照表，即無需另編未收器存目。

(四) 本局近年出版了本書編輯組成員張亞初先生編撰《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書，其中釋文頗受讀者歡迎，特在本書版面附載張亞初先生所作釋文（個別略有改動），以利讀者使用。

原書極個別器名在目錄、圖版、說明及釋文之間小有差異，這次改版盡可能做了統一。但是由於隸定方法和所用字體的不同，仍存在彼此點畫小異的異體字。為慎重起見，我們一仍其舊，未將其劃一，望讀者察之。

為方便讀者，這次出版時，在保證絕大部分器銘原大的前提下，開本由原八開變為大十六開，冊數由原十八冊調整為八冊，價格亦相應大幅降低。

這次調整與改版，目的是方便讀者，但由於水平有限，難免有錯誤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六年一月

前 言

這部《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經過我所《集成》編輯組的同志們多年來辛勤的勞動，現在資料搜集行將完成，編纂工作大體就緒，第一冊已經可以交付出版了。今後，其他各冊也將陸續付印。這部書的出版，將為殷周青銅器的研究，尤其是青銅器銘文的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因之，我們相信，這將會促進這方面研究工作的進一步發展。

三十多年前，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初成立時，在郭沫若院長的領導下，鄭振鐸所長和梁思永副所長親自抓考古研究所的發展方針和遠景規劃的制訂工作。當時的設想是：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任務應該放在創新方面，便是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質量，以便取得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然後利用這些新取得的資料，結合過去累積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但是同時也認為，對於我國有悠久歷史的金石學，尤其是其中的優良傳統，也應該加以吸取和發展，使之成為系統化的古器物學，而後者可以作為現代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般認為是中國考古學前身的金石學，在北宋時代便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以圖像和拓本（包括摹本）來表現古器物 and 古文字的金石圖譜，在當時便出現了。但是，當時金石學的內容，如果依照現代的學科分類來說，實際上包括有銘刻學（Epigraphy）和考古學（Archaeology）兩門學科。北宋金石學家呂大臨在《考古圖》的序文中說：「觀其器，誦其言，形容彷彿，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他把古器物的形制和銘刻的文詞二者區分得很清楚。

現代的考古學，是利用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實物（不限於古器物，還包括人類居住及其他活動的遺迹，以及反映人類活動的自然物，如農作物、家畜和狩獵品的遺骸），進行歷史研究的一門科學。它和利用文字記載進行歷史研究的狹義歷史學，都是歷史科學（廣義的歷史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是以恢復人類歷史的本來面目為目標，二者對於歷史科學的研究，猶如車子的兩輪，不可偏廢。不過，考古學的對象一般都是屬於一定時間以前的古代，所以近代史和現代史不屬於考古學的範圍。歷史越古老，文字記載越稀少，考古學研究也就越重要。到了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史前史的研究便幾乎完全

依賴考古學了。因之，史前史也便等於史前考古學。

銘刻學是對古代刻在金、石、甲骨、泥版等堅固耐久的實物上的銘文進行各方面研究。這些研究包括認識文字、讀通文句、抽繹文例、考證銘文內容（例如考證紀年、族名、邦國、人名、地名、官名、禮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據字形、文例、考證的研究結果，來斷定各篇銘文的年代和它們的史料價值。它是以銘文作研究的主要對象，所以除了把其中的古文字經過考釋改寫為今日的楷書以外，它的考證方法和利用傳世的一般古代文獻記載一樣，完全是屬於狹義的歷史學範圍。但是，它又是以古代遺留下來的金、石等實物上的銘文為研究對象，而這些實物又經常是要通過考古發掘才重新被發現出來的，所以它從前常被隸屬於考古學這門學科下作為一個分支。事實上，它現在已經由附庸蔚為大國，常被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了。埃及、希臘、羅馬等地方古代紙草寫本（Papyrus）的研究，已獨立成為一門「紙草寫本學」（Papyrology）。就寫本內容而言，可以算是銘刻學的一部分，但它所用的書寫材料是紙草，並且是書寫、不是鑄刻，所以一般的銘刻圖錄不收紙草寫本。關於我國漢晉簡牘的研究，日本學者稱它為「木簡學」。它也是同樣的情況，既可以算銘刻學的一部分，又可以獨立自成爲一門分科。

至於古文字學，又是另一門學科，是語文學的一個分支。我們通常所稱的「中國古文字學」，實際上是漢字的古文字學。它包括西文中所謂古字體學（Palaeography），研究古字的形體以確定古寫本的年代和地區）、語源學（Etymology，探討每字的原始意義）等。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漢字古文字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漢族古代文字的形體、聲音和字義（詁訓）。它的内容既包括銘刻學的資料，也包括像許慎《說文解字》之類的並非銘刻的輾轉傳抄下來的書本上的有關資料。銘刻學家一定要懂得他所研究的那一部分銘刻上的古文字。反過來說，古文字學家也一定要懂得怎樣去利用銘刻學中與他的研究有關的資料。二者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有許多學者同時既是銘刻學家，又是古文字學家。但是這兩門學科的重點是有所不同的。清代樸學鼎盛時，古文字學家推崇《說文》，認爲許（慎）學爲小學（古文字學）的「不祧之祖」。有人譏笑當時的銘刻學中的金石文字研究爲「善辨模糊字，博攻穿鑿文」。近代我國古文字學家如章太炎、黃侃師生二人，對於甲骨、鐘鼎的銘刻，都是抱有偏見的。章太炎最初完全否認甲骨文，直到去世前，仍以爲「甲骨之爲物，真偽尚不可知」；至於金文，他晚年時仍認爲「鐘鼎可信爲古器者，什有六七，其釋文則未有可信者」，以爲是「穿鑿之徒，皮傅彝器，隨情定字」（湯

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一九七九年版，九四三、九五四、九五五、九五七頁。黃侃晚年曾說過：「（鐘鼎、甲骨）雖其文字不容致疑，惜其解說猶有可疑處。故學者莫如先玩其拓文，而不必急讀其解說可也。」（《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一九八三年版，一九頁）我們平心而論，現今我國許多學者對於銘刻中古文字的解說，其中雖也有可疑的，但是更多的地方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讀其解說，怎能知道這些解說可疑與否？如果我們參考前人的解說而不自目輕信，豈不是更容易地使用自己的判斷力來解決銘文的認識問題嗎？黃侃的話，可能是對着像他自己那樣精通古文字學的學者而說。一個銘刻學者是不會說這樣的話。一個毫無偏見的古文字學者也不會這樣說的。這裏也許可以看出古文字學和銘刻學這兩門學科的着重點的不同處。王國維說的話比較公允。他說：「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毛公鼎考釋·序》）現下仍有個別搞銘刻學的人，過份強調銘文的解讀，有時完全不顧古文字學的原則或通例，將一些不易考釋的銘文中每字都加考釋，每句都加解說，實際上不過是「穿鑿附會」而已。這在現下的銘刻學界當然只是個別的現象。古文字學家中有些人也不免有這種偏差。

我們將考古學（包括它的組成部分的古器物學）和銘刻學的涵義搞清楚後，便可以進一步來討論像《集成》這一類書籍的性質和它的重要性。我國北宋以來編纂得比較完善的金石圖錄的內容，常是包括有古器物的圖像和銘文的拓本（包括摹本），并且附以文字的說明。但是，有的圖錄擴大了收錄的範圍，所收入的圖像包括大量的沒有銘文的古器物，後來甚至於有的全書都是沒有銘文的古器物。這些沒有銘文的古器物，常常不是金屬或石制的，例如泥俑之類的明器。這樣，它們便成為古器物學的圖錄。近代古器物學家羅振玉曾指出：「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學，金石學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收入《永豐鄉人甲稿》中）實則，古器物學也只能包括金、石等質料的古器物的形制和花紋的研究。至於古器物上銘刻的考釋和研究，那是屬於銘刻學，而不屬於古器物學。另一方面，有些金石圖錄偏重為銘刻學提供資料，僅有銘文的拓本（包括摹本），不附圖形。羅振玉曾經嘆息說：「（金石學）後世變為彝器款識之學，其器限於古吉金，其學則專力於古文字，其造詣精於前人而範圍則轉隘。」（同上）實則這種學科發展後引起的分化，乃是自然的趨勢。有些學科只有把範圍加以隘小後，研究才可更為深入。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使之向康健的方向發展。學科的發展是這樣，圖錄編纂的發展也是這樣。

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後不久（十六世紀），歐洲學者便特別注意古典時代（即希臘、羅馬時代）的遺迹和遺物，

因為他們是想把文學和藝術復興到古典時代那樣的高峰。十八世紀時這風氣更盛。他們把旅行到希臘、羅馬的古代都市去憑吊古迹作為治學修養的一部分。「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情。」他們憑吊之餘把這些古迹描繪下來，返國後便有人把這些描繪下來的圖景，連同臨摹下來的銘文，一起加以製版印行。十八世紀末拿破侖遠征埃及時，順便帶了一隊學者到埃及去進行實地的史地考察。後來，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學者于十九世紀前半葉，也組織幾次古物調查團到埃及去。他們都描繪古迹，臨摹銘刻，返國後把古建圖景和銘刻摹本印出來。這樣便推進了埃及學這一門學科的發展。

被視為近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的德國學者J·J·文刻爾曼(Winckelmann 1717~1768)研究羅馬美術史，所利用的資料不限於古文獻，而是大量利用傳世的或新近發掘出來的美術品實物，以作系統的深入研究。考古發掘工作開始於十八世紀對於赫叩雷尼和龐培的發掘，逐漸成為考古學的主要方法之一，鋤頭打開了地下的歷史資料的寶藏。同時，新發現的希臘、羅馬的銘刻，也層出不窮。德國學者A·鮑刻(Böckh)編纂出版了《希臘銘刻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四大冊(一八二八~一八五九年出版)。著名的羅馬史大師Th·蒙森(Mommsen)也主編了十六卷本的《拉丁銘刻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一八六二年)。此外，又有《伊朗銘刻集成》(一九五五年開始刊行)，《印度銘刻集成》(一九七〇年開始刊行)等等。由於考古發掘工作中幾乎每年都有新發現的銘刻，所以這一類的集成都是未經編完便已需要準備編纂補編，每隔一段時間以後便要出版補編。有些考古發掘工地出土有新銘刻，這些銘刻資料整理後，或者作為正式發掘報告的一部分，或者獨立成書，另冊單行出版。至於希臘文和拉丁文銘刻學，每年都出有年鑑，發表每年新發現的銘刻。

和西方的銘刻學相比較，我國的銘刻學有自己的特點：(一)甲骨刻辭是我國所特有的。(二)先秦銘刻以金文為主，數量很多，而且有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石刻銘文則先秦時的極為罕見。(三)我國漢文始終使用以象形為基礎的文字，不用字母拼音，所以銘刻中的古文字數量眾多，字體繁複而多變化。(四)漢代以來的銘刻，除璽印和碑額外，一般使用隸楷和正楷，和今日所通用的楷書並沒有多大差別，一般仍都可以認識，只是有些異體字而已。秦代的和先秦的銘文的解讀，則需要有古文字學的知識。(五)甲骨和殷周銅器，由於近代古董商人的作假，其中有不少偽刻的銘文，甚至器物本身也是贗品，這需要先作「去偽」的工作。解放以後出土的大量有銘文的銅器，它們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可以省掉「去偽」的工作。(六)我國至遲在唐代已有墨拓銘文的技術，這比臨摹要正確的多。清末引進照相術和照片製版術，器物 and 拓本的印刷更為逼真了。根據上述的

特點，我國金石圖錄便形成一套慣例，以適應這些特點。

考古研究所開始籌備編纂古代銘刻集成時，便想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改進，使令體例更爲完善，資料更爲齊備。最初曾聘請徐森玉老前輩兼任《歷代石刻圖錄》的主編，並爲他配備了兩位專職的助手。又調來甲骨金文專家陳夢家，請他在研究工作之外，替所裏籌劃《甲骨文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的編纂計劃，並曾開始進行拓本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後來，《歷代石刻圖錄》的工作，由於徐森玉感到自己精力不濟，堅辭他所擔任的主編職務，只好中途停頓下來。現下正設法恢復這工作。一九五九年，本院歷史研究所承擔了甲骨文的資料集成工作，當時考古研究所把已搜集到和新拓的三四萬張拓本全部借給他們利用。現下《甲骨文合集》的圖版部分已經全部出齊。考古研究所保留項目《殷周金文集成》，却由於種種原因，幾經周折，一九七九年初才正式成立編輯組。編輯組的同志們修訂了編輯體例後，繼續搜集和整理資料，加緊進行工作。

這幾年本書編輯組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是：在這一類書籍的編纂工作中，首先需要目標明確。只有明確了目標以後，才能確定所收資料的選擇標準，編纂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具體凡例。本書的性質是學術性的資料書。編纂工作中會遇到許多問題需要進行研究，加以解決。但是資料性的書並不要求在研究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得出創造性的新成果。其次，本書應該是一部青銅器銘刻的集成，而不是一部青銅器圖錄。所以，它的内容要以銘文爲主體，沒有銘文的商周銅器一概不加收錄。本來這一類銘刻集成性質的書，可以不收器物的圖像，《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錄遺》等書便是這樣。它們收入少量的戈、戟、矛、劍、鐘等全形拓本，算是例外。不過，我們考慮到商周銅器的器形和花紋的研究，常常對於銘文的斷代和考釋有決定性的意義，而銘文的研究對於器物的斷代、命名和用途，也是這樣。所以本書將器物的圖像盡可能地一併收入，以便參考。尤其是圖形中那些從前未曾發表過的，或者僅發表在現已不易找到的書刊上的，以及原先發表的圖形模糊不清的，更是有這種必要。銘刻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可能會認爲只要有銘文拓本便够了。但是考古學家總是希望能看到器物的圖像。又其次，我們打算在本書的銘文和圖像部分完成之後，接着便編纂釋文部分。因爲從事中國先秦史的學者中許多人不懂金文，缺欠古文字的知識，所以如果書中不附釋文，他們對這部書將無法加以利用。釋文部分只附必要的小注，不作長篇的單字考釋和銘文考證（這些最好另行發表）。但是要注意出必要的參考文獻。最後，全書要附以索引，以便檢查。

全書的編輯方針和大致內容一經確定，《集成》編輯組又提出幾點基本要求，作爲奮鬥的目標。首先是要求資料儘量齊

備。但是有些資料一時無法獲得，只好將來連同此後新出土的資料一起收入補編中。其次是資料儘可能做到正確。這裏包括對於傳世品的器物 and 銘文要去偽存真，對前人著錄中的錯誤加以校正等等。又其次是文字說明要簡單扼要。既要刪除不必要的重複，同時又要提供一切有用的有關參考資料。最後是要求檢查方便。這包括歸類和排列的恰當，和附以必要的索引。分類法要避免不必要的標新立異，以致使用時不易檢查。至於器物圖像和銘文拓本印出來後是否清晰，這雖是技術性的問題，也要特別加以注意，要求能達到一定的水平。如果花紋和銘文模糊不清，讀者便無法加以利用了。這些要求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並不一定都能辦到，所以只能說是奮鬥的目標。

其他方面的具體問題，在《出版說明》和《編輯凡例》中另有詳細交代，這裏不再重複了。

最後，我為本書第一冊的出版，謹向《集成》編輯組的同志們致賀，希望他們再接再勵，在不久的將來，順利地完成全書的編纂工作。另一方面，我代表考古研究所，對所外有關各方面的同志們的大力支持和協助，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夏 鼐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于青島

出版說明

《殷周金文集成》和《甲骨文合集》一樣，都是郭沫若同志五十年代交辦的任務，是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醞釀已久的大型編纂項目。一九五六年，國家製訂十二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兩種集成曾列入考古學發展規劃（《甲骨文合集》又見歷史科學發展規劃）。後來，《甲骨文合集》的編纂任務於一九五九年由本院歷史研究所承擔，《殷周金文集成》則推遲到一九六三年四月由我所着手進行，並同時列入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各研究所研究規劃。我所當時決定，《金文集成》的編纂工作由陳夢家先生主持，他曾提出詳細的工作計劃，日常工作則由王伯洪、王世民二同志負責組織，準備一九六九年完成任務。隨後，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未能立即投入較多的人力，乃安排我所資料室陳公柔、陳慧和二同志，先從整理本所多年積累的金文拓本入手，開始進行資料準備。他們花費三年的時間，將所藏上萬張金文拓本整理一遍，基本查明這些拓本的著錄情況。正當工作剛剛起步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陳夢家先生和陳慧和同志不幸亡故，王伯洪同志不久也因病去世，有關資料暫時封存起來，工作停頓了整整十年。

一九七六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我們在郭沫若同志的殷切關懷下，迅速着手恢復《金文集成》的工作。開始，仍由資料室的兩三位同志進行基礎性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調查解放後出土和過去著錄殷周有銘銅器的基本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由我所第二研究室和資料室人員共同組成的金文集成編輯組，於一九七九年初正式成立。編輯組是在夏鼐同志的指導和督促下開展工作的，由王世民同志具體負責，經常參加工作的有陳公柔、張亞初、劉雨、曹淑琴、劉新光、王兆瑩六位同志。此後，編輯組又將較多的精力用於廣泛收集資料，並對已有的金文拓本和銅器照片進行全面清理，進一步做好編纂的資料準備。從一九八二年起，則在繼續補充資料的同時，轉入具體編纂的工作階段。一九八二年八月，《殷周金文集成》列入國務院批准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最近，又被列為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項目。

按照預定計劃，《殷周金文集成》的內容包括銘文、圖像、釋文和索引，而以銘文為主體。關於銘文部分的編輯體例，我們曾經設想，殷商和西周以時代為綱，春秋、戰國以國別為綱，儘量將史事、人物、族組等項相關的銅器，以及同坑出土者集中在一起。後經反復考慮，感到這種體系對於金文集成並不適宜，具體編纂起來將會遇到許多困難，既有相當數量的資料難以妥善處理，又不易達到可以信手拈來的翻檢便利。於是，我們放棄了不切實際的打算，仍然採取傳統的金文著錄方式，以器類為綱，按照字數從少到多編排。至於器物的年代、國別和族組、同坑關係等項，將分別在各個分冊的文字說明和全書末尾的輔助索引中加以解決。

本書收錄的金文資料，包括殷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各類器物，年代下限斷至秦統一以前。宋代以來各家著錄和國內外主要博物館藏品，力爭收集得比較齊全。各地新出土的發掘品和採集品，以各冊編成時已公開發表者為限。預計所收器銘的總數當在萬件以上。書中採用拓本的主要來源有五：（一）考古所多年積累的舊拓本，（二）《考古學報》和《考古》的檔案，（三）編輯組同志前往有關單位新打製的拓本，（四）若干文博單位提供的現成拓本或拓本原大照片，（五）若干單位或個人借給的拓本。其中，第（一）（二）兩項共計約五千器，第（三）項將近三千器，第（四）項一千餘器，第（五）項為數不多。再有一定數量的器銘，因手頭缺少善拓或僅有摹本流傳，採取剪貼《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錄遺》等書，或由我所技術室按比例復製其他著錄書，用兩種辦法將其補齊。版面上的器名由我所編輯室劉勛同志一手繕寫。

我們希望，在編纂工作中，把資料收集得齊全一點、準確一點，並且儘可能地剔除偽器，但這都不容易做好。關於齊全和準確，通過認真的核校，應能使遺漏和失誤降低到最小程度，但也難使之盡善盡美。至於去偽，一則由於許多器物未能目驗原器，二則由於編輯組同志水平所限，更難掌握得恰到好處。

從一九六三年我們開始安排金文集成工作，到現在能將第一冊交付出版，已經整整二十年了，把十年動亂的耽擱除外也有十年之久。全部編完這項大部頭的資料總集，估計尚需花費七八年的時間。幾年來，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主要依靠各方面的的大力支持。我們十分感激已故的唐蘭、容庚二先生和于省吾、徐中舒、陳邦懷、商承祚、張政烺等老一輩專家，感謝馬承源、李學勤和其他許多同志。他們或曾關心這項工作，對我所的同志多有鼓勵，提出過寶貴的參考意見，或曾將自己珍藏、經管的資料，無保留地供給採用。在收集資料方面，得到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陝西省博物館的幫助最多。對

我們的工作給予不同程度幫助的，還有北京、天津、湖北、遼寧、陝西、河南、山東、河北、山西、江蘇、安徽、浙江、湖南、廣東等省市有關的文物博物館單位。其中，有的單位允許我們派人對其藏品進行墨拓（或一並照相），有的單位提供我們現成的拓本的圖像。我們又曾得到外國某些博物館和考古學家的熱情幫助。凡此，均在文字說明中逐件進行具體交代。這裏統一向各方面表示深切的謝意。我們還要特別感謝中華書局和上海出版印刷公司的同志，他們爲使這部龐大的金文集成達到較高的印製水平，付出了巨大的勞動。

最後需要指出，我所金文集成編輯組的人數較少，除個別同志外，都是中年同志，見聞不是很廣，經驗不是很多。現在，經過大家的努力，在較短的時間內拿出了成果，但疏漏錯誤之處是在所難免的。我們希望各方面的同志給予批評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王仲殊

一九八三年國慶日

編輯凡例

- 一、本書是殷周時代有銘銅器資料的集成性彙編，年代下限斷至秦統一以前，內容包括銘文、釋文、索引及相關附錄，而以銘文爲主體。
- 二、本書收錄下列四個方面的資料：
 - (1) 國內外博物館、其他單位和私人收藏的傳世銅器；
 - (2) 各地歷年考古發現中獲得的銅器；
 - (3) 宋代以來著錄諸書中現已不知所在的器物；
 - (4) 未曾見於著錄的銘文資料。
- 三、本書以器類爲綱，按照我國考古學界通常採用的殷周銅器類別編次。排列的先後順序是：樂器、炊器、盛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其他。
- 四、各類器物的銘文絕大部分原大製版，縮小者則於版面上標明原圖版高度，按照字數從少到多排列。重文和合文，在說明中括注另計。全書所收器物統一編號。一器數拓者，在編號後附加1、2、3……表示之。
- 五、本書所收有銘銅器，一般均依作器者命名。個別器物有習用多年的舊稱，在各分冊的目錄和說明中括注，銘文的版面則從簡不注。
- 六、本書每一分冊銘文部分後錄有該冊銘文說明，逐一交代所收器物的字數、時代、著錄、出土、流傳、現藏、資料來源，以及其他需要說明的情況。出土、流傳和現藏情況未能明者，則將該項省去。
- 七、本書說明中標注的時代，一般是大致的年代。器銘內證明確、向無爭議的標準器，又將所屬王世括注於後。所標年代的相

當公元如下：

殷代 約公元前十三——前十一世紀末

西周 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前七七一年

西周早期（武王至昭王）

西周中期（穆王至夷王）

西周晚期（厲王至幽王）

春秋 公元前七七〇——前四七六年

春秋早期 公元前七七〇——前七世紀後半

春秋晚期 公元前七世紀後半——前四七六年

戰國 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二年

戰國早期 公元前四七五——前四世紀中葉

戰國晚期 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前二二二年。

八、本書銘文說明著錄項下所列書刊，均經編者逐一查核。銘文說明列舉的，只是著錄該器銘拓本（或摹本）的書刊，首列《金文總集》《三代吉金文存》，其餘大體按出版時間為序。

沒有拓本和圖像，但作考釋的書刊，不予列舉。《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商周彝器通考》以外的通論性著作，綜合性文物圖錄，所收器銘和圖像除非再無其他更好的著錄，一般也不贅舉。

本書所錄著錄書刊用簡稱，詳見書末附錄三「器物著錄書刊索引」。

九、本書銘文說明所述諸器出土、流傳等情況，考古發現的器物即來源於著錄項列舉的考古報告或簡報，傳世品則括注其文獻根據，未注明者多依有關博物館藏品卡。

十、本書銘文說明中的現藏情況，現存國內各地博物館和其他單位的器物，多經編輯組實地調查，流散海外的器物，其資料來